

论汤显祖“为情作使，劬于伎剧”思想的成因

储著炎

(安庆师范学院黄梅剧艺术学院, 安徽安庆, 246133)

摘要:达观禅师之所以提出“情有者理必无, 理有者情必无”这一佛学论断, 其用意在于劝说汤显祖以理破情, 进而皈依佛法。在佛学层面上, 汤显祖虽然认可达观的这一说法, 但是两人在人生哲学、文艺观念等方面存在着的诸多差异, 使得汤显祖对于情理问题有着不同于达观的独特思考。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儒家救世情结, 加之达观实践人格的实际影响等等因素的交互, 最终坚定了汤显祖“为情作使, 劬于伎剧”的人生道路。

关键词:汤显祖; 达观; 为情作使; 劬于伎剧; 禅学; 儒家救世情结

中图分类号: I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3)04-0187-04

达观禅师对汤显祖的影响很大, 特别是在情理问题上。达观曾经向汤显祖提出“情有者理必无, 理有者情必无”的佛学主张, 引起了汤显祖的共鸣。在《寄达观》中, 汤显祖曾说:“情有者理必无, 理有者情必无。使我奉教以来, 神气顿王。”^{[1](1351)}楼宇烈先生认为:“汤显祖对达观‘情有者理必无, 理有者情必无’的论断还有其自己的理解, 不一定完全符合达观的原意。但其中受到达观禅学思想的一定影响, 这也是无疑的。”^{[2](162)}楼宇烈先生的观点, 是比较中肯的。在情、理问题上, 汤显祖确实受到达观佛学思想的影响, 但显然又有着他自己的理解。那么, 达观所谓的“情有者理必无, 理有者情必无”这一论断的真实内涵是什么呢? 汤显祖对于达观所提出的情理问题又有着怎样的看法? 汤显祖的情理观在何种程度上受到达观佛学思想的影响? 本文试图以汤显祖与达观之间的交往与信笺往来入手, 以期探讨这样一些问题。

一

达观即真可禅师, 晚号紫柏, 明代四大高僧之一。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将他与李贽并列, 推崇两人为当时思想界的“二大教主”。其云:“紫柏老人气盖一世, 能于机峰笼罩豪杰。”“至辛丑, 紫柏师入都, 江左名公, 既久持瓶钵, 一时中禁大珰趋之, 如真赴灵山佛会。”^{[3](691)}达观与汤显祖交情很深, 遇合甚奇。汤显祖在《答邹宾川》中云:“弟一生疏脱, 然幼得于明德师, 壮得于可上人。”^{[1](1449)}“可上人”即达观。

在《莲池坠簪题壁二首》诗前小序中, 汤显祖说到他与达观的遇合奇缘:“予庚午(隆庆四年, 1570)秋举, 赴谢总裁参知余姚张公岳。晚过池上, 照影搔首, 坠一莲簪, 题壁而去。庚寅(万历十八年, 1590)达观禅师遇予于南比部邹南车郎舍中, 曰:‘吾望子久矣。’因诵前诗, 三十年事也。师为作《馆壁君记》, 甚奇。”^{[1](577-578)}万历十八年十二月, 汤显祖任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时, 在江西同乡南京刑部广东司署员外郎主事邹元标处正式结识达观。此前达观禅师游方偶见汤显祖的题壁诗, 此次相晤, 达观因诵前诗, 二人神交既久, 此后终身莫逆。

徐朔方先生曾说:“对汤显祖思想影响最深的人莫过于禅宗大师达观。”^{[1](4)}情理问题是汤显祖思想的集中体现, 是汤氏哲学观、人生观、文艺观的核心问题。考察汤显祖的情理观, 应该联系汤氏与达观之间的交往, 两人曾经针对情、理问题展开过一场探讨。万历戊戌(二十六年, 1598)三月, 汤显祖自遂昌知县任上弃官家居。是年秋, 汤氏为《牡丹亭》撰写《题词》, 《牡丹亭》创作完成。是年岁除, 达观来到临川。达观在《礼石门圆明禅师文》中曰:“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予自庐山归宗寺, 挈开先寿公, 与吴门朗驱乌, 来临川。”^{[4](885)}汤氏《梦觉篇序》亦云:“戊戌岁除, 达公过我江楼, 吊石门禅, 登从姑哭明德先生往反。己亥上元, 别吴本如明府去栖龛峰, 别予章门。”^{[1](564)}达观万历二十六年岁除来到临川, 二十七年上元离开临川。他此次临川之行将汤氏法号寸虚改为广虚, 并为是年殇逝的汤氏爱子西儿作《悼西儿名序》。其时《牡丹亭》已经完成。达观临川之行, 应该

知道《牡丹亭》的创作,但他显然对汤氏“为情作使,劬于伎剧”不满^{[1](1221)},所以他才在离开临川后寄来一封长信,即《与汤义仍》其一。达观在信中说:“真心本妙,情生即痴,痴则近死,近死而不觉,心几顽矣。”^{[4](1039)}他希望汤氏远情近理,明性拙情,因为“理明则情消,情消则性复,性复则奇男子能事毕矣,虽死何憾焉!”^{[4](1040)}在情、理问题上,达观尊理拙情,主张以理破情。在他看来,汤氏给他的遗憾在于“昧性而恣情”^{[4](1039)}。他认为汤显祖“受性高明,嗜欲浅而天机深,真求道利器”^{[4](1039)},希望能够淡薄世缘,因为“世缘一浓,灵根必昧”。^{[4](1041)}

针对达观的来信,汤显祖在回信《寄达观》中云:

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真是一刀两断语。使我奉教以来,神气顿王。谛视久之,并理亦无,世界身器,且奈之何。以达观而有痴人之疑,疴鬼之困,况在区区,大细都无别趣。时念达师不止,梦中一见师,突兀笠杖而来。忽忽某子至,知在云阳。东西南北,何必师在云阳也?迩来情事,达师应怜我。白太傅、苏长公终是为情使耳。^{[1](1351)}

据徐朔方先生《寄达观》文后笺证,此文作于万历二十六年汤显祖自遂昌知县弃官以后。在《紫柏老人全集》中有《与汤义仍》信笺两则,《其一》所谈问题与汤氏《寄达观》内容相应,所以汤氏《寄达观》应是对达观《与汤义仍》(其一)的回复。汤氏弃官家居后的心情显然很是矛盾,他在《达公来自从姑过西山》诗中云:“厌逢人世懒生天,直为新参紫柏禅。”^{[1](563)}在入出与出世的抉择中,汤氏的思想出现了危机。在此之前,即汤显祖在遂昌知县任上时,达观就历尽千难万险,来到遂昌。他之所以来到遂昌,其实就是劝说汤显祖了却尘缘,忘情人世。在遂昌,汤显祖陪达观游览唐山古寺,达观有诗云:“踏入千峰去复来,唐山古道足苍苔。红鱼早晚迟龙藏,须信汤休愿不灰。”^{[5](32)}他将汤显祖比作唐末五代著名画僧贯休,希望他能精研佛学,了却人世情缘。达观的临川之行,二人更是“无情当作有情缘,几夜交芦话不眠”^{[1](580)}。达观的临川之行,加之别后的信笺劝说,使汤显祖开始“新参紫柏禅”。夏写时先生认为:“达观以理破情实有之,汤显祖以情破理则未必。他只用‘谛视久之,并理亦无’这种禅家习用的机锋轻轻一点,就把达观视情、理不两立的偏执性指点出来了。”^{[6](261)}其实,从汤氏“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真是一刀两断语”之语来看,他并没有认为达观情、理不两立就是偏执。可以说,汤显祖也一直没有放弃对“理有情无”的追求。汤显祖曾说:“达观氏者,吾所敬爱学西方之道者也。”^{[1](1053)}在《南柯梦记题词》中,汤显祖

曾说:“梦了为觉,情了为佛。”^{[1](1157)}在晚年所作《续栖贤莲社求友文》一文中,他曾经反省自己:“岁之与我甲寅者再矣。吾犹在此为情作使,劬于伎剧。为情转易,信于痠瘡。时自悲悯,而力不能去。想明斯聪,情幽斯钝。情多想少,流入非类。吾行于世,其于情也不为不多矣,其于想也则不可谓少矣。随顺而入,将何及乎?应须绝想人间,澄情觉路,非西方莲社莫吾与归矣。”^{[1](1221)}这种思想其实与达观的佛学思想是相一致的。

二

达观的情理思想虽然影响了汤显祖,但汤显祖对于情理问题显然有着自己的理解与阐释。在回信中,汤显祖有意提到了达观的“痴人之疑”与“疴鬼之困”,来为自己“为情作使,劬于伎剧”的行为辩解。所谓达观的“痴人之疑”,据德清《达观大师塔铭》言:“一日闻僧诵张拙《见道偈》,至‘断除妄想重增病,趋向真如亦是邪’,师曰:‘错也。当云:‘方无病’,‘不是邪’。僧云:‘你错,他不错。’师大疑之,每至处,书二语于壁间,疑至头面俱肿。”^{[4](627)}所谓达观的“疴鬼之困”,据达观自述:“往年抱疴松云间,来慈偕其弟匡石,多方调治。予性不耐服药,复恣情所爽口者,故疴鬼得肆焉。”^{[4](879)}在情理问题上,达观主张:“夫玄黄无咎,咎生于情。情若不生,触目皆道。故情有理无者,圣人空之;理有情无者,众人惑焉。”^{[4](708)}“理之攻情,何情不破;情之攻理,谁当其攻。”^{[4](1008)}在汤氏看来,“以理破情”很难,就是达观自己,“无情无尽怜情多”^{[1](581)},也不能做到无情无咎,可见“以理破情”何其难哉!所以他才以达观“有痴人之疑,疴鬼之困,况在区区”之语来为自己不能“忘情”辩解。

可以说,根源于儒家仁孝的入世情结使得汤显祖最终未能做到忘情尘世,逍遥世外。汤氏“情痴一种,固属天生”^{[7](34)},在他的思想深处,始终没有放弃对有情尘世的执著。尽管他“平生只为认真,所以做官做家,都不起耳”^{[1](1519)},难免“厌逢人世”,但他始终不以得失为念,“为邑吏有声,志操完洁,洗濯束缚,有用与行矣”。^{[1](2584)}虽然他弃官家居后以“茧翁”、“义仍”自号,但他始终关注着有情人世,以情痴自许;虽然在汤氏晚年,确有向佛家皈依的倾向,如在汤氏逝世前二年,他倡建栖贤莲社,试图皈依佛门,但汤氏此举因母丧未果。汤显祖“先慈之哀,继之先严。创钜痛深”^{[1](1540)}。蒋士铨《临川梦自序》谓汤显祖:

“白首事亲，哀毁而卒，是忠孝完人也。”^{[8](209)}晚年的汤氏，虽然有出世之想，但儒者的仁孝，使他终不能忘情尘世，超然物外。

达观在来信中告诫汤显祖“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其真实的用意还在于想让汤显祖斩断“情”的羁累，与世浮沉。达观所谓的理与情分指“无我”与“有我”，他说：“理无我而情有我故也。无我则自心寂然，有我则自心汨然。寂然则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汨然则自心先浑亦如水浑不见天影也，况能通天下之故哉？圣人知理之与情如此，故不以情通天下而以理通之也。”^{[4](1008)}他向汤显祖宣扬“以理破情”，意在劝说汤显祖破除“情”的执著，做到“无情无我”以与世浮沉。其时汤氏官场的失意、爱子的殇逝，种种逆境，在达观看来，此是“年来世缘，逆多顺少，造物不忍精奇之物，沉霾欲海，暗相接引，必欲接引寸虚了此大事”。^{[4](1041)}但汤显祖认为，真正做到“忘情”太难，况且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与世浮沉”更难，所以他才屡次劝告达观披发入山，远离祸场。这从达观《与汤义仍》(其二)信中可以看出，其云：

屡承公不见则已，见则必劝仆，须披发入山始妙。仆虽感公教爱，然谓公知仆，则似未尽也。大抵仆辈，披发入山易，与世浮沉难。公以易者爱仆，不以难者爱仆，此公以姑息爱我，不以大德爱我。昔二祖与世浮沉，或有嘲之者，祖曰：“我自调心，非关汝事。”此等境界，卒难与世法中人道者，惟公体之，幸甚。……仆一祝发后，断发如断头，岂有断头之人怕人疑忌耶？^{[4](1042)}

其实，当时劝告达观披发入山、远离祸场的不止汤显祖一人。在万历三十一年达观因为“妖书”事件死于狱中之前，“门弟子皆知都下侧目，师相继奉书劝出。开侍者刺血具书，隐去”。^{[5](146-147)}可以说，汤显祖是理解达观所提出的“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思想的本意，但他不认可达观与世浮沉的说法，因为在当时那个世道，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据陆符《紫柏尊者传略》记载：“上以三殿工开矿税，中使辈出。有李道者初奏，南康守吴宝秀抗旨逮治，其夫人哀愤投缢死。师闻之曰：‘良二千石为民请命死，其妻自且不免，时事至此乎！’遂入都门营救。”^{[5](146)}面对旁人的百般劝告，达观辄云：“断发已如断头，今更有何头可断。”^{[5](147)}他的这种不惜以身命弘法的救世精神，深深地震撼了汤显祖。万历三十九年，汤显祖在为友人汤宾尹《睡庵文集》所作的序中写道：“道心之人，必具智骨；具智骨者，必有深情。”^{[1](1074)}这既是再次阐明真正做到“无情”太难，更是借作序这一机缘，对达观悲天悯人的智骨深情所作的一次凭吊。

三

正是因为达观“情有理无”的佛学启迪，加之达观与世浮沉、不惜断头的救世深情，让汤显祖对于情理问题有了更为透彻的了解，即世外之法虽然追求无情，但“人生而有情”^{[1](1188)}，世内之法重在有情，尤其是达观令人感伤的不幸遭遇，让汤显祖认识到“情”之于人世的弥足珍贵，更加坚定了“为情作使，劬于伎剧”的决心。汤显祖在《清莲阁记》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

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唐人受陈、隋风流，君臣游幸，率以才情自胜，则可以共浴华清，从阶升，娱广寒。令白也生今之世，滔荡零落，尚不能得一中县而治。彼诚遇有情之天下也。今天下大致灭才情而尊吏法，故季宣低眉而在此。假生白时，其才气凌厉一世，倒骑驴，就巾拭面，岂足道哉。^{[1](1174)}

达观的不幸遭遇，其实就是当时社会“灭才情而尊吏法”的真实写照。为了将“有法之天下”改造成“有情之天下”，汤氏“劬于伎剧”，努力从事戏曲创作。他生前创作的戏曲作品应该不止现存这些，据钱谦益《汤遂昌显祖传》记载，汤氏之子开远“好讲学，取义仍续成《紫箫》残本及词曲未行者，悉焚弃之”。^{[1](2587)}汤显祖之所以“为情作使，劬于伎剧”，原因在于他认为戏曲可以：

使天下之人无故而喜，无故而悲。或语或嘿，或鼓或疲，或端冕而听，或侧弁而哈，或窥观而笑，或市涌而排。乃至贵倨弛傲，贫啬争施。瞽者欲玩，聋者欲听，哑者欲叹，跛者欲起。无情者可使有情，无声者可使有声。寂可使喧，喧可使寂，饥可使饱，醉可使醒，行可以留，卧可以兴。鄙者欲艳，顽者欲灵。可以合君臣之节，可以泱父子之恩，可以增长幼之睦，可以动夫妇之欢，可以发宾友之仪，可以释怨毒之结，可以已愁愤之疾，可以浑庸鄙之好。然则斯道也，孝子以事其亲，敬长而娱死；仁人以此奉其尊，享帝而事鬼；老者以此终，少者以此长。外户可以不闭，嗜欲可以少营。人有此声，家有此道，疫病不作，天下和平。岂非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也哉。^{[1](1188)}

《礼记·乐礼》云：“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9](1097)}汤氏将戏曲功能描述得无以复加，其作用简直可以凌驾于儒家礼乐的教化功能之上，这使我们想起了他的“至情”思想。在《牡丹亭·题词》中，汤显祖曾对“至情”有过一番阐释：“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

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1](1153)}在汤显祖那里,戏曲的教化功能之所以并驾乃至凌驾于儒家礼乐,原因就在于一个“情”字。“至情”既然可以使生者死、死者生,那么如果“因情作剧”,自然会使戏曲因为这“至情”的作用而实现它的功能最大化。晚明祁彪佳在《孟子塞五种曲序》中曾说:“盖诗以道性情,而能道性情者,莫如曲。……自古感人之深而动人之切,无过于曲者也。”^{[10](621)}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只有戏曲才是“情”的最好载体,所以汤显祖才从“情”的人世本体意义与形而下的社会功用出发,将戏曲的救世功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艺观上,达观认为:“大概立言者,根于理不根于情,虽圣人复出恶能驳我!”^{[4](1008)}但在汤显祖看来却是“无情师印有情文”^{[1](682)}。在《耳伯麻姑游诗序》中,汤显祖说:“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因为憺荡人意,欢乐舞蹈,悲壮哀感鬼神风雨鸟兽,摇动草木,洞裂金石。其诗之传者,神情合至,或一至焉;一无所至,而必曰传者,亦世所不许也。”^{[1](1110-1111)}左东岭先生认为汤显祖所说的“情”,“从文学思想上讲,此情是指文学产生的原动力以及感化人心的艺术力量,它是文学得以产生并传之久远的决定思想因素,同时也是它能够发挥教化百姓、和谐社会的根本原因。”^[11]汤显祖以文艺为阵地,以戏曲为号角,充分利用戏曲教化人心的便利,努力实践他的救世决心。作为一代佛学大师的达观,自然不可不讲性、讲理;但是作为文学家、戏曲家的汤显祖,他的人生实践与艺术天地却少不了情的参与,也正是因为一个“情”字,成就了他的理想人格与艺术辉煌。

有学者认为:“汤显祖‘为情作使,勉于伎剧,为

情转易’达到‘信于疼虐’的程度,正说明他是极大地关注感性个性生命的本真存在状态的。这与他的道气论、贵生论、主动的认识论是一致的,也是明末重自然人性时代精神的反映。”^{[12](205)}可以说,从社会文化思潮角度来看,汤显祖的“勉于伎剧”,是那个时代重自然人性精神的反映;从内在因素与深层视角来看,正是因为达观“情有理无”佛学思想的启迪,以及达观不惜以身命弘法这一实践人格的影响,加之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儒家救世情结,等等因素的交互,最终坚定了汤显祖“为情作使,勉于伎剧”的人生道路。

参考文献:

- [1] 汤显祖. 汤显祖全集[M]. 徐朔方笺校.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9.
- [2] 楼宇烈. 汤显祖哲学思想初探[C]//汤显祖研究论文集.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4.
- [3] 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4] 紫柏尊者全集[C]//藏经书院编. 已续藏经: 第126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94.
- [5] 紫柏尊者全集[A]. 藏经书院编. 已续藏经: 第127册[C]. 台北: 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94.
- [6] 夏写时. 论中国戏剧批评[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8.
- [7] 吕天成. 曲品校注[M]. 吴书荫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8] 蒋士铨. 蒋士铨戏曲集[M]. 周妙中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 [9] 李学勤主编. 十三经注疏: 礼记正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10] 孟称舜. 孟称舜集[M]. 朱颖辉辑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11] 左东岭. 阳明心学与汤显祖的言情说[J]. 文艺研究, 2000(3): 98-105.
- [12] 邹元江. 汤显祖的情至本体论[C]//汝信, 张道一, 主编. 美学与艺术学研究: 第二集.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1996.

The Cause of “Opera Creation for Emotion” of TANG Xianzu

CHU Zhuyan

(Huangmei Opera School of Art,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133, China)

Abstract: The Zen master DA Guan put forward “emotion and reason are incompatible” aimed at telling TANG Xianzu to cut off emotion and prevent him from converting to Buddhism. Although TANG Xianzu recognized this statement from Buddhism, he had unique thinking about this problem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ces such as philosophy and literary view. The salvation sentiments rooted in Confucian, in addition to the personal quality of DA Guan, finally led him to “Opera Creation for Emotion”.

Key Words: TANG Xianzu; DA Guan; Opera Creation for Emotion; thought origin; Buddhism; the salvation sentiments

[编辑: 胡兴华]